

十年前的几个瞬间

曹景行

十年前的五月十五日清早，国航飞往成都的班机起飞了。很准点，难得，可能因为我们是“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后首班飞向灾区的客机，满载救援紧急用品。乘客也全都冲着震灾而去，起码一半为记者和医务人员，还有几位特殊人物，成为与我“不期而遇”的采访对象。空降兵某师长坐我右边，两天后我就跟他上了安-26运输机拍摄空投实况；左边是华航老总，他赶去成都迎接台湾运来的捐赠物资，两岸间的直航也就此开启。

快到成都双流机场了，我跟空姐要几个小餐包，当作去灾区采访途中的干粮。她们二话不说，拿了一只大塑料袋把机上餐后余下的面包、黄油和果酱都放了进去，让我带给灾民，并带去她们的问候。

与以往正常采访不同，到了成都后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首先是车。临走前一天在清华大学为继续教育学院的企业家班讲课，一位学员说他在成都的分公司可派车送我。出了机场接上头，又捎上同机来的央视记者李小萌和摄像，我们立即加入长长的车流直奔灾区。接着几天我还借用过中移动的车、空降兵的车、军区的车，才有可能进入灾情严重的地区四处采访，有时就连摄像带设备都借用他们的。

一天早上我们赶去什郊市的鳌华，那里的磷肥企业灾情严重，化工原料泄漏，空气中弥漫着淡黄色的雾气。军队救灾中心的指挥官正焦急地发出一道道命令，要求加紧搜索前方下落不明的数百名磷矿工人，时间越来越紧迫。结束采访，回程途中遇到对面过来一列车队，估计是前往视察灾情的，我们立即调头跟上。



三月的暖风一起，似乎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味蕾，在草叶急长的气息中热切地苏醒过来。

放了学，我们疯了似的往山坡上跑。那里一大片一大片的茅草地，正在悄没声儿地孕有一种美食。冬天里，我们拔出枯黄的茅草，把它们长长的根须浸到河水里淘洗，露出洁白的甘蔗似的小节根。放到嘴里嚼一嚼，满口淡淡的清甜。现在，这些微甜的汁液全都顺着新抽的茅草茎叶往上，往上，一直聚集到它最鲜嫩的中心。那里微微鼓胀着的，是紧含着的它的花苞，我们叫作茅针。用两个手指取住它，“破”地一声，轻轻抽出，剥开来，里面躺着一枚绒绒软软却又丝光亮滑的芯子，是极可口的小食。这茅针原是淡味的，嚼在齿间，却透出鲜洁的清香，和一丝似有若无的甜意。蹲得累了，我们便跌坐在茅草地上，或者干脆卧着，把一面坡的茅针拔得吱吱响。太嫩太细的不要，嫌芯子还太薄。太鼓太胀的往往又都老了，吃起来味同嚼絮。最后得的一大把又嫩又肥的茅针，用扎辫子的细橡皮筋绑住，一边剥着吃，一边悠悠地走回家。

不久，茅针从裹着它的叶鞘里钻出来，开花了。那些鲜美的嫩苞，都成了蓬绒绒的尾巴，一片片在坡地上招摇着。

我们抽出几支茅草的绒花，互相往脸庞上挠着，边闹边笑，往高高的山上跑。那里，野杜鹃开得正热闹。粉色的杜鹃这里一丛，那里一丛，都向我们笑盈盈地招呼。随便摘一枝，扯几朵，抽掉像蝴蝶的触须般颤颤伸展着的花蕊，把花儿捏作一团，扔进嘴里。薄薄的花瓣经不起咀嚼，很快化作一团甜酸的汁液。

但粉色的杜鹃花儿留不住我们的脚步。我们迎着风，继续向更深的山里行进。往往是在巨大的岩石边，深一两米的山谷里，甚至陡峭的崖壁上，开着一丛丛殷红殷红的杜鹃花。那才是野杜鹃花中的上品。颜色不必说，它的亦甜亦酸的滋味，比粉色花儿也要浓郁得多。我们连花蕊都舍不得丢弃，全嚼进去，虽然

环保部长周生贤下了车，见到我们颇有点意外，但也立即接受采访。他强调要防止化工原料泄漏污染旁边的沱江，不能让2004年沱江污染事件再次发生。他还保证地震灾害并未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首次明确回答了国际媒体那几天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立即用手机与凤凰卫视总部连线，发出这条重要的独家新闻。

十年前灾区采访中的一个瞬间，已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在绵阳，清早我走出宾馆大门，前面花园那片帐篷里好多人已经起身，他们都是来自上海的医生。问一位医生为什么晚上住帐篷而不进房子睡觉，回答是救灾最需要医生，医生必须保护好自己，住帐篷是为防震震。只是从上海舒适的家突然来到灾区，在冰凉的草坪上打地铺，难免整宵辗转难眠。天一亮他们就收拾整理，立即赶往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救人。

灾民的安危牵动人心，绵阳体育馆和体育场都成为收容安置中心，从北川撤下来的北川中学师生暂栖长虹公司总部。体育馆门口小山般堆着各地送来的救灾物资，十分充足，领取的人却不多。成群的志愿者忙着登记灾民家庭信息，身后大块的布告板上贴满了寻人条子。场内挤满了打地铺的老老小小，却没有太大声响，好些人坐着躺着认真细读当天的报纸，好像要从字缝中抠出家乡和亲人的消息。

一位老人突然拖住我的手，说他是老师，常看我的节目。“两个孙子都没了，都没了，怎么办？……”话音未断眼泪就流下来……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把他的手握得更紧。离开体育馆时，我从志愿者桌子上取了一个红布条绑在相机上，意味着我也是一位志愿

者。这时一队远道跋涉而来的灾民走进大门，一家接着一家，说是经过几天翻山越岭，满脸疲惫中夹带着宽心的神色，现在终于安全了。那天我在新闻直播的评论中特别提到灾民同样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

绵阳是名酒剑南春的产地，绵竹市内满街的酒香正是灾情严重的指标。在一处幼儿园废墟前，我从尘泥中捡起了一只粉红色小鞋子，还有几页老师的课堂记录，却不知它们的主人是生是死。一位《工人日报》的记者拖我去街头另一角，只见一家杂货店的主人已经在摧毁的家门口摆起摊子，售卖地下挖出的残余生活用品。一对年轻夫妻坐在地上，用锤子敲开倒塌屋子的柱梁，取出里面的每根细钢筋。我问他们在干嘛，妻子说“再建个家，日子总是要过的”，眼角似闪着泪花。再往前，路口已经有人摆起了理发摊位。“日子总是要过的”，他们同样在抗震救灾，更带出了灾后自救的生气和活力。

在绵阳遇上一支别处来的基干民兵队伍，五月正是四川收割油菜籽和麦子的时侯，他们放下家中农活前来救灾。我问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怎么想的，他嗓门不大地回答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很稳重。在都江堰一处楼房倒塌的废墟前，我见到来自河北唐山的一对叔侄。他们一听到四川大地震的消息就相约到北京，买了机票赶来灾区。那位叔叔说，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全国都来救灾，帮助唐山渡过难关，“今天四川有难，我们义不容辞！”这样的唐山人不是一个，还有整个企业全都过来的。

天气越来越热，烈日和暴雨交替，救灾官兵很是辛苦。公路边上停着上百

辆旅游大巴，头尾相接起码一两公里长，车内狭小空间就是官兵临时营房。全新的野战炊事设备运到了救灾第一线，成都太平寺机场是部队空投物资的基地，跑道旁边几张方桌就是指挥中心，也是临时用餐的地方。每有一架运输机降落停下，就有数十战士火速推去一车车物资，每堆上面都覆盖着白色的降落伞。

这些士兵都好年轻，在我眼中都还像似孩子。他们已连轴转了好几天，极度疲累。那天完成空投回航时，师长下令“睡觉”，整机官兵“刷”地一声躺倒，一个靠着一个，不一会儿就在运输机震耳轰鸣中睡着了。回北京后我听说有些救灾士兵连日泡水出现“烂裆”，顿时想到那一张张稚气的孩子脸，心都揪起来了。

救灾分秒必争，我们抢新闻也如此，成败往往就在一瞬间。那天凤凰卫视同事胡玲与我在成都会合，为了采访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灾区，早上三点多就摸黑出发，由成都赶往绵阳。经历了十二个小时的各种辛苦，终于在安置灾民的体育场内“堵”到了采访机会。但就在开始提问时，旁边的人群把我们的摄像记者越推越远。眼看采访就要中断，娇小瘦弱的胡玲一手把话筒塞到我手里，另一手抢过摄像机自己继续拍摄，镜头中的画面很快恢复稳定。总书记谈到灾情和救灾部署时，还特别通过我们向香港同胞表示衷心谢意，“请大家相信，我们会努力把抗震救灾工作做好”。

十年过去了，又到了收获油菜籽的时候，似乎又听见当年“四川挺住，中国雄起”的声音。难忘啊！

笔会

记录

高原风情
(国画)

李宝堂

有一次，看见一株倚墙而栽的梨树，枝叶稀疏，独挂了满满一树梨子，在篱墙上方轻轻地晃悠。我们抬头看了一会儿，终于按捺不住，几人合力，居然爬上高高的石头篱墙，踮脚将够得到手的梨都摘了下来。那些小型才有乒乓球大小，各人拿衣襟兜着，匆匆忙忙地躲到远处，一尝，全是涩的，又不舍得丢掉。直到晚饭时，妈妈嘟哝起几个小鬼把谁家的青梨给摘了，我才慌忙趁着夜色，把梨子全丢进了河里。

然而果子对味蕾的诱惑是巨大的。我们村子西北面有个果园，是拿一整座小山开垦出来的。山顶上出的大西瓜，甜得方圆几里闻名。更有三月的花季里，一面坡上遍开粉嫩的桃花，一面坡上尽是雪白的梨花，走过去，整个人仿佛都给带着甜意的花香陶醉了。为了防人来偷果树果子，四下里的山脚都挖成了深深的沟壑，壑上再竖起高大的灌木篱墙。得了沟壑里泉水的滋养，这一带长起连片的公公红，还有一大株繁茂的金钩，高高倒挂在一处山脚壁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一得空就爱往那儿跑，为的自然不光是去采公公红和金钩。从山脚下望上去，眼看着园子里的果桃越长越大，由青而白，由白而泛出微微的粉红。我们早发现北边的篱墙有一处洞眼，足够一个小孩钻进钻出。有一天，趁着午后人少的时间，我和两个女伴偷偷从那个洞眼钻进园子，想去摘桃吃。我们不知道的是，看守园子的女主人早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一行三人刚下手，这位农妇一声大吼，赶将上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记忆里唯有一次进园偷果子的冒险，就这样仓皇而终。

不久，公公红也落了。我们四处游荡着，继续寻找新的食物。把美人蕉的大花朵掰下来，吸食花冠底里的一点花蜜。把野地里的玉米秆子折断，当甘蔗似的吃得咩咩响。但那样鲜美丰盛的味觉，注定已是一个季节的回忆。初夏的风吹过去，带起一丝闷热。我们的春天的筵席，就在这日益逼人的热气里，渐渐走向了尾声。

最早与火车有关的记忆，是气味。记得第一次乘火车，是父亲带我回他的老家无锡。为了省钱，坐的是沪宁线上的慢车，一路上大小车站都要停一停。站台上总有售货车在那里守株待兔，车一停稳，便有人下车购买当地土特产。到了苏州，便买上几盒卤汁豆腐干，无锡自然是用小笼包招徕旅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都囊中羞涩，能够大快朵颐的只是少数人。看着别人吃，自然是有些馋的，尤其对于一个孩子。父亲对我说，回程一定给我买豆腐干。

长大后，行程越来越远，旅途上遭遇的美食越来越多。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符离集烧鸡和德州扒鸡。一节车厢里，只要有一个人在享用，足够全车厢的人肚子咕噜一阵子的。如此美食，岂能无酒。往往是的两三人，一瓶烧酒，还有一包不知哪里变出来的花生米，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这是一种细水长流型的吃法，拿着鸡腿并不着急三两口解决，而是顾盼生姿，近乎炫耀。

其实绿皮客车里的主流气味并不来自于食物，而是某种夹杂着汗臭和机油的混合味道。尤其是在冬季，车窗紧闭，常有近乎窒息的瞬间。夏季里打开车窗，大家都赞成，只是临窗的人要吃苦头，迎面而来的热风也颇让人吃不消。有一回，我实在困乏，睡着了，醒来后，半边脸如睡了一般，头也昏沉沉的，下车到家睡了一夜，第二天都没有缓过来。春秋时分，望着窗外，似乎可以闻到花香和麦香，然而那也只是意念罢了，但终归是美好的。

食物在别人的嘴里，气味要么可羨，要么可恶。我有一位同事，最厌恶别人在班车里吃肉包子和韭菜盒子，有同感的人或不在少数。然而长途旅行，免不了要充饥，通盘考虑周遭人的感受而选择食物，怕也是不大现实。

小时候在我眼里，上餐车吃饭的人都是有身份的。父母是普通劳动者，周末全家打牙祭不过就是小吃部里点碗馄饨，买半斤糖醋排骨。所以餐馆就是高档场所了，而提供炒菜的餐车就是次等的地方。家里有个叔伯，有一次带我去餐车用餐，点了醋溜鱼片，那滋味印象深刻。叔伯算是见过世面的，也不禁夸厨师的手艺好。多年后，自己偶尔去餐车点一两个菜，但味道至多是小炒的水准，可能是嘴刁了？

不知什么时候，方便面，尤其是味道浓郁的红烧牛肉口味的成了很多人旅途的标准用餐，一根火腿肠也往往成了标配。起先，人们并不太反感，但日久生恨，对此白眼相向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方便面加火腿肠本身气味的浓烈，封闭车厢不通风等因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现在的人，越来越看重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注重自我的感受，所以对于车厢里各种感官刺激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较之气味的传播，肢体的接触更是现代人力求避免的。然而倒退几十年，车厢里摩肩接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运力紧张的年代，车厢里大多数时候总是满满当当的。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乘客买的是站票，甚至还有逃票混上火车的，他们就倚靠着座椅靠背的侧边站立在过道里。如果遇上旺季，连狭小的卫生间里都挤着三四十个人。有时候累了，站着站着就睡着了，随着车厢的摇晃，不免就靠在了别的旅客的身上。如无大碍，被碰着的人往往不作反应，在意的人至多用肩膀向外轻轻顶一下，打盹的人往往似睡非睡地移动一下身軀，若其无事。换作现在，不致歉一下，会被视作无礼。有些长途旅行的站客久立了，还会提出“分让”的请求，央求座客彼此挤一挤，让出半个屁股的位置好让自己坐下，甚至有遭拒后强行蹭位的。

绿皮火车上是面对面的长条座椅，没有扶手，旅客间的肢体碰撞无可避免。加之靠背笔直，若要换个舒服的姿势或歪斜着小憩，无意的彼此倚靠几乎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今天的高铁里经常不满员，座位宽大，过道里行走自如，回想过去，简直恍若隔世。

与过去的旅行相比，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耳根子清静了许多。不仅仅是因为听不见了蒸汽机车头发出规律的律动和间或的长鸣，车轮压过枕木和地轨时富有节奏感的咔塔声被单调的车体与空气的摩擦声所取代。

最近一次，和父亲一同回老家扫墓。旅途上，父亲与一个中青年男子相邻而坐。父亲好几次都开启了话头，但都被一两句敷衍的话把话聊死了。后来那人干脆拿出手提电脑，做出了一副勤奋工作的模样。很显然，他没有与陌生人聊天的打算。

对于父亲那一代人而言，聊天与打扑克一样，是旅途中的固定项目。彼此不相识的人简直无话不谈，而且透明度很高。可以相互通报各自的工作水平，介绍彼此单位的大事小情，询问对方子女的婚嫁状况……对于那些谪于言的邻座乘客而言，他们想要不入耳都是很难的。这样的闲谈在车厢里随处可见，此消彼长。

小时候，我不明白父亲何以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坦诚相待，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在那个年代，虽然信息透明，但由于人际间的网络化程度很低，所以不必担心谈话内容会被广泛传播。在彼此间亲切友好的交谈后，一拍两散，相忘于江湖。

与火车有关的记忆

钦文

打扑克的人发出的欢笑和咒骂声，也是车厢里永恒的旋律。打牌和聊天也可以同步进行，只不过这样的聊天不会很深入，毕竟一大半心思要花在牌局上。一两局打下来，座位前后左右总有些技痒的看客会围拢上来，出谋划策者有之，点评者有之，甚至不乏煽风点火的人。如果你是个不爱打牌的人，偏偏遇到上了这样的状况，那么只能怪自己买票选错了时机。

大哥大问世后，列车上打电话成为一种炫耀和时髦，进而成为公害。前排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在电话里与客户谈着生意，与数额上千万的钢材有关；身边的姑娘脸贴在手机上，跟男友一会儿撒娇一会儿怄气，欲罢不能；后座一位西装男士接到电话后，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正在公司开会，然后就挂了，继续跟身边那位美女谈笑风生……其实他们的生意、私生活我都不感兴趣，然而各种吹嘘、诉说就是这么钻进我耳朵里。现在好多了，大家都在摆弄着自己的智能手机，顶多偶尔听见一两声莫名其妙的傻笑。

智能手机的出现，让视觉在旅途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人是个喜欢社交的民族，自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紧密结合之后，人们的社交范围大大扩展了。眼睛盯着屏幕，人与人在空间里打得火热，你一言我一语，转发个笑话，斗个表情包，好不热闹。但与陌生旅伴的交流仅限于，为了方便进出让对方侧身让道时说一声“谢谢”而已。

当然也有人将手机视作阅读工具，读着各类娱乐八卦或严肃新闻、网络小说或世界名著。记得过去，火车站里有个很大的柜台，上面铺满各类书报杂志。最受欢迎的是法制文学，这是一种结合了侦探和八卦的文体，最为适合旅途打发时光。带一本《战争与和平》在路上，则会让人刮目相看，或许因此遇上一段奇缘也未可知。现如今，看不到书皮，人们将自己的阅读旨趣也藏了起来。在虚拟世界里，最好让大家都知道我，在现实世界里，最好不要有人知道我是谁，这大概就是许多人的心理写照吧。

当然也有旅客对社交和阅读都不感兴趣，拿着手机或平板只是为了打游戏或追剧。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旅途中视觉的中心就是那块屏幕。这未免太可惜了。窗外的风景，车内的人与物，难道就一点也不能吸引我们了么？这种视觉焦点的转移，也有其客观原因。越来越多的火车座位不再采取面对面格局，人们的视线被前排座椅的靠背所遮挡，几乎看不见别的旅客，侧目观察那个对你丝毫不感兴趣的邻座毕竟太过唐突失礼。进入高铁时代，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窗外的景象飞逝而过，很难捕捉到什么有趣的细节，比如一只跳跃在草丛里的野兔……从主观层面来说，习惯了短平快的多媒体视听刺激后，对于慢速的视觉刺激和细致的观察，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在我看来，旅途的乐趣也因此少了许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